

閩 西 人 民 斗 爭 史

(一九一九年——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

張 鼎 丞

——寫于延安中央黨校

（一）闽西的政治经济概况与共产党的产生

闽西是指福建省的西南地区，它包括：长汀、宁化、清流、明溪、连城、上杭、武平、龙岩、宁洋、漳平、永定、平和、南靖等县。北部与赣南毗连，西部与粤东接壤，崇山峻岭，交通不便，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共有一百七十多万人口，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的特点，在闽西的表现也是很明显的。闽西没有现代化的工业，只有分散的、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以及中、小商业。农业生产是落后的，粮食产量不高，不能维持自给。人民生活所需要的日用品，如布疋、油盐、药材等均需靠外地进口。有各种手工业，有丰富的土产和特产，其中生产较多的是纸张、烟丝、木料茶叶等，土特产有相当大的数量是销售全国各地的。闽西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用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创造了大量财富。

闽西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是非常厉害的，约有百分之六十至八十的土地（包括公田在内），是集中在地主手里。他们出租土地的平均地租要占农民的收获量百分之五十、六十甚至百分之八十。地主往往又是高利贷者和商人，他们高利贷的剥削也是很严重的。穷苦人民一般借贷的利息是百分之二十以上，而高利贷则是百分之三十至五十，甚至有百分之百的。

闽西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也是非常严重的。田赋除正税外，还有许多附加税，甚至在一年中预征了好几年的田赋。苛捐杂税不但有数百种之多，而且税率也非常高，不论纸张和烟丝或其它产品，从生产地销售就要缴纳十几次的捐税。此外，军阀官僚还任意向人民摊派军饷，抽收特种捐。军阀官僚还强迫农民种鸦片，从中征收高额鸦片

税。

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在闽西也是无例外的，无论城乡或市镇，到处充满了洋货，而土产和特产则受到严重打击。纸张和烟丝的生产，一年不如一年，且有不少的制纸业和制烟业关门倒闭。

因此，闽西的社会经济，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地主的层层剥削下是落后的破产的，而广大人民的生活是日益贫穷的，是灾难深重的。

闽西的政治是反动的，它是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服务的。盘据在闽西各地的大小军阀，就有：李凤翔、王献臣、赖世坝、郭凤鸣、陈国辉、曾少奎、张贞等头目。他们各据一方，称王称霸，招民买马，摧残人民。闽西只是大小军阀争权夺利，连年战争的地方，据历史所载，自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五年间，就有大小战争达三十余次之多。战争对于经济的破坏，带给人民的痛苦是数不尽的。这些军阀又大肆卖官鬻爵，而豪绅地主头目纳职，如县长、区长、营长、连长都成为商品。他们互相勾结，残害人民，又互相攻击，抢夺地盘。他们制造了许多土匪，又承认土匪为合法官兵，因而官兵即土匪，盗贼成官兵。他们开赌坊，设妓馆，横行暴戾，加横加赋。社会是混乱的，黑暗的。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制度和反动势力，虽然经过辛亥革命和反袁运动，经过许多仁人志士的不断斗争，而受到了打击，但这只是改朝换代，反动不颠倒。在实际上军阀官僚、贪官污吏，地主豪绅，流氓土匪仍极猖狂地统治着闽西。只是而且只能是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始在全国范围内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的口号，进行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而闽西的广大人民也才真正地在全国人民在一起进行彻底的革命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土豪劣绅、反对高利贷、反对高额地租、反对苛捐杂

税，实行“二五”减租等口号，这个口号是闽西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的革命口号。因此，通过“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运动，闽西地区和全国其它地区一样，革命运动的规模逐渐扩大，而参加运动的人数也一次比一次增多。

闽西共产党的产生和发展，走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开始的。是由邓子恢、郭滴人、林心尧、阮山、蓝维仁、朱疾黎等同志加入共产党后在闽西进行革命活动，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并建立了党的组织的。闽西有了共产党组织之后，在龙岩、永定、上杭、长汀、平和等县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同时帮助国民党建立国民党的组织，并组织了工会、学生会、农民协会等群众团体。我们有了党的领导，又有了群众组织，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党的主张政策，也宣传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并开始有组织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当国民革命军入闽时，我们领导了群众做了许多革命工作，支持了国民革命军，驱逐了北洋军阀。在国民革命军入闽后，罗明、蓝维仁、林心尧等同志即在上杭开办“汀属八县社会运动人员养成所”，以培养群众运动的干部。阮山、林心尧等同志在永定曾召开各界民众代表会议，讨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种改革工作，决定“二五”减租，决定发展工会和农民协会等组织。在龙岩、永定、上杭等地实行反对苛捐杂税，实行“二五”减租的群众运动，并取得胜利。于是闽西的革命运动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

然后，在一九二七年，正当闽西广大群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反对土豪劣绅，反对苛捐杂税，实行“二五”减租运动的时候，正当闽西的反动统治受到革命打击的时候，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就进行了叛变革命的“四·一二事变”。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各

地大规模地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而闽西的政治形势也就和全国其它地区一样，急速地恶化了。闽西的军阀贪官污吏及一切反革命派都响应了蒋介石的“四·一二”事变。

“四·一二”事变时，福建的国民党反动派在福州、厦门屠杀共产党员，而闽西的军阀郭凤鸣、蓝玉田等反动派用武力解散“汀属八县社会运动人员养成所”及人民的革命团体，在上杭屠杀共产党员林心尧等同志，同时，在龙岩、永定等县的反动派也相继捕杀共产党员，并解散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和镇压革命运动。

当时，党在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下，没有作出必要的准备，因此在敌人的进攻下，闽西的革命运动和全国其它地区一样，遭受到暂时的挫折和失败。

（二）争取群众实行武装起义和土地革命

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国民党叛变革命后，闽西的国民党与封建势力——军阀、官僚、豪绅地主勾结在一起，重新恢复了反动统治，使人民的痛苦有加无已。在此时期，闽西党的组织虽然遭受了一些破坏，但党的组织基础仍然保持，并进行了一些巩固组织工作。“八一”南昌起义后，贺龙、叶挺诸同志率领部队进入上杭、永定时，闽西党组织首先和他们接上了关系，并进行了较多的革命活动。同时，在长汀、龙岩、上杭、永定、平和等县都建立了党的县委会，还成立了闽西四县特委，并确定了“争取群众、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的斗争方针。

为了实现这一方针，争取广大群众实行革命斗争是基本问题。闽

西的广大群众在大革命时期，受过减租减息和反抗捐税的宣传教育，又有南昌起义的影响，因而斗争情绪日益高涨。但是，我们知道，争取广大群众是一个艰苦的工作，是伟大的革命运动的开端。

经过十多年来残酷的斗争，闽西的群众运动的经验是丰富的，我们还未来得及系统地全面地总结，现将永定溪南区群众运动，从最小的工作起，直到武装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作一全过程的概括的总结。溪南区虽是闽西许多区乡中的一个，但总结一个区乡的经验，大致可以看出闽西群众运动的规模和群众斗争的力量了。

一、首要问题是教育干部

溪南区是永定城的乡区，由东到西有四十华里，由南到北有六十华里。共有两万多人口，都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大多数乡村都有小学校，小学教师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或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大多数乡村都有党和团的组织。这些共产党员和团员，他们与群众特别是青年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他们愿意接近群众，而群众也欢喜他们。但是，当时的党组织是年轻的，对于怎样团结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没有一套成熟的经验；因此，教育党员和团员，并使他们逐渐成为团结群众进行斗争的干部，便成为党组织的首要任务。

我们教育党员和团员，是以党的政治主张和政策为基本内容。即：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反对国民党军阀、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压迫剥削，反对收租、逼债，反对苛捐杂税等。把党的这些主张和乡村中群众受压迫剥削的事例结合起来，在党团员中反复地讨论，启发他们提意见，打破他们的顾虑，坚定他们的信心。同时，我们又经常地教育党员干部要深入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要时刻关心群众的疾苦，关心群众的利益，并把群众的事情看成自己的事情。祇

有这样才能取得群众的信赖，成为他们的领导者。

我们就在这些思想基础上，经常不断地鼓励他们的工作，并解决他们在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我们在支部生活中表扬好的，批评坏的，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逐步地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和工作积极性。

在教育党员干部的同时，我们又在各乡村中普遍办起了平民夜校，通过这一形式，争取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并通过党团员在夜校里教育群众，特别是教育青年群众。我们讲过许多大道理，也讲过许多有益于群众的日常利益的事情。例如我们教育群众要做好人：不嫖、不赌、不吸食鸦片，要勤勤俭俭，搞好生产。我们通过那些因赌钱或吸食鸦片而倾家荡产的例子，用生动活泼的语句，激发群众对旧社会的仇恨，从而揭发豪绅地主、军阀官僚的罪恶，开展反对苛捐杂税的宣传。因此，我们的平民夜校很快地取得广大群众的同情与拥护。

我们不仅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教育了党的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并且在这个时候的组织工作，也有很大的发展。首先在各乡村普遍地建立和健全了党的支部，发展了党的组织，普遍地建立了团的支部，发展了团的组织。其次，农民协会的组织也有大量的发展，由原来数量不多的情况发展到四、五千个会员，其中尤以金沙等地的农会真正成为群众自己的团体。其次，对半武装性质的“铁血团”的组织也开始注意了，凡在党组织基础较好的乡村，都有了“铁血团”的组织。

因此，溪南党组织为争取广大群众而斗争，已打下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了。

二、远大的目标与平凡的事情

我们是共产党人，要实现党的政治主张并为其最高理想而奋斗，

必须从实际出发，从群众最容易接受而又是最关心的事情做起，从“平凡的小事情”着手，远到远大的目标。当时，乡村中有不少人因嫖、因赌，或吸食鸦片而引起纠纷或家庭不和睦的事情，并且这些旧恶可还影响了不少的青年群众，不务正业而荒工废时。自从党提出不嫖、不赌、不吸食鸦片的口号，又有党、团员的积极作用，所以很快地就成为群众行动口号。并由群众在农民协会中提出禁赌、禁烟的主张，我们领导了这一工作，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因此，乡村中的旧风气下降而新风气上升，显示了新的气象。

其次，在金沙秀溪乡有姓张的两房人几代以来传统的不和睦。同时，秀溪乡与卓坑源两个村子，因争夺一小块土地，打了几年官司，双方都花了几千元，但没有解决问题，因而，双方仇恨很深，甚至准备械斗。这些姓氏纠纷和地方斗争，对于我们争取群众是莫大的障碍，也是群众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因此，党支部根据这一事实具体分析纠纷的原因，并确定排除纠纷的办法。当时为了便于各阶层群众容易接受党的口号，所以提出：“和乡党睦宗族”，作为调解的口号。这个口号，对于宗法社会有守旧思想的人，是很容易接受的。但这只是一个旧形式而其内容和目的则是为了争取群众。经过党、团员耐心地向群众劝说，并用事实教育群众，说明秀溪乡和卓坑源花了几千元打官司，结果是：“出钱受苦的是老百姓，发财享福的是县老爷”。又说，劳苦人民只有团结才是力量，而贪官污吏则希望地方闹宗派，闹纠纷。因为闹宗派，正是他们可以“分而治之”，达到他们的剥削的目的。俗语说得好，“离破狗钻”正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所需要的是团结友爱，我们所反对的是军阀地主。经过党员和团员劝说和带头作用，他们终于和睦起来了，

并且真正做到大家友好，人人欢喜。

由于我们关心了群众的事情，那怕是平凡的事情，都能想办法解决，所以群众普遍反映：几年来乡中父老乃至是老爷调解不了的纠纷，倒由共产党解决了，共产党真正是为人民做好事的党。于是乡村及邻近的群众一致称赞我们的党，称赞我们的同志。我们是一点一滴的，只要有利于群众的事情，我们都去做了，因而，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更加抬高了。

三、请求豁免冠婚丧祭屠宰捐

我们的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提高了，为了进一步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从斗争中教育和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我们研究和分析了群众的思想与要求，并确定了斗争策略和方法。当时各阶层群众最痛恨的是“冠婚丧祭屠宰捐”群众说：“谁无丧祭，谁无结婚，而国民党反动派不论人民的喜事或丧事都要捐税”。所以人人痛恨，而我们确定的直接斗争对象又是恶霸捐税。溪南的恶霸捐棍丘乾凤经常地调查杀猪杀羊的群众，并经常地敲诈勒索，捉人罚款。尤其有一次有一个农民的小牛快要死了，那个农民报告丘乾凤，要求免税宰杀，丘乾凤不答应，后来那个农民恨恨地把小牛埋在土里，又被丘乾凤发觉了还罚了款子。因而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无比愤恨，连士绅们也表示反对。

因此，我们所确定的斗争对象是人人赞成的；我们采取的政策是统一战线的，团结尽可能多的群众参加；我们采取的方法又是合法的请求县政府豁免，我们选择的时机又是旧历年关来临，群众杀猪宰羊最多的时候，所有这些都是很适当的。

党委确定这一斗争的计划后，先在支部中，在夜校中，在农民协会中，在青年群众中进行讨论，并由党、团员起积极作用，然后在广

大群众中进行宣传鼓动，立即得到了全乡群众的一致赞成和拥护。同时，我们召开士绅座谈会，并决定由一百多名“有名望”，“有势力”的绅士领头具禀向县政府请求豁免“冠婚丧祭屠宰捐”。我们预先估计到选择这个斗争口号，能够动员最多的人参加，不但劳动人民拥护，即使有钱人，他们杀猪吃肉更多，也能争取他们参加。果然不错，争取了各阶层群众参加了，正如当时一些中间分子说：“纵使不能批准，也不会犯法”。所以胆子不大的，还有害怕的也都参加了。这一斗争的目的，是为了争取群众，教育群众，如果胜利了当然更好地团结群众，即使失败了也可在群众中揭穿反动政府的真面目，使群众更加拥护我们，靠拢我们。

群众的代表已赴县请愿，群众的斗争已经起来了，旧历年关日益逼近，杀猪宰羊者日多，恶霸捐棍要收捐款，而群众一致不缴，大家同口同声说：要政府豁免。于是捐棍着急了，便施行恐吓，说要请兵捆人。到了斗争日益激烈，空气愈形紧张时，群众愈表示坚决，而个别绅士便动摇起来，企图推卸责任。此时，我们一方面发动群众制造舆论：“平时有肉吃，有好处就出头当士绅，现在有事便缩头缩脚，请看吧……”以监督那些动摇者，另一方面则召集士绅会议，表明斗争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同时表明如果政府捕人入狱，则以全乡群众为后盾，进行坚决斗争，需要用钱先用公款，用完了再由全乡群众负责，以示决心。我们采用这种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使得各阶层人民，特别是进步人士一致团结在反苛捐杂税的斗争中来了。

腊月二十九日，恶霸果然带了武装队伍来捕捉抗捐的群众，在他所谓“擒贼先擒王”的意图下，首先被捕的是一位著名的绅士张恒隆。并梦想这样一来，便可使群众驯服地缴捐纳款了。但是，我们党有了

充分准备，一声号召之下，全乡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成千上万的人，手举旗子，高呼口号，浩浩荡荡地进城不假请示。当时全城震动了，反动政府派人拦截挡住，不准南恩群众入城，而群众一拥而进。于走，县长慌忙地派出代表与请愿群众接洽，我们立即提出三个条件：被捕的绅士立即释放，豁免冠婚丧祭屠宰捐，惩办包捐祝的恶棍。政府的代表且即时答应释放绅士，并说明豁免捐税须待省政府批示，暂时可以不缴。因此，我们得到了圆满的胜利，群众的斗争情绪更加高涨，而恶霸捐棍，躲藏的躲藏，跑走的跑走，销声若迹了。自从这一斗争胜利后，不仅冠婚丧祭屠宰捐不缴了，而且一切苛捐杂税都不缴了，我们完全胜利了，达到了团结群众教育群众的目的。而群众也第一次地认识到团结就是力量。

我们党的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贪官污吏和反对苛捐杂税的口号，是通过这样具体的道路而胜利实现的。由于这一斗争的胜利，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更加提高了，党与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了。同时在这一斗争过程中党的组织也发展了，我们吸收了积极坚决和勇敢的分子入党，从原有的四、五百党员发展到七百多个党员。其次农民协会也扩大了组织，由四、五千个会员发展到七千人。在斗争已进入激烈尖锐的时候，我们愈益感到武装组织的重要，此时我们决定扩大“铁血团”的组织，参加“铁血团”的都是一些斗争勇敢而身强力壮的青壮年，他们加入时都“喝血酒”，以示同生死共患难，团结一致地进行解放斗争。

四、进行阶级斗争分粮吃大户

自从反苛捐杂税得到完全胜利后，群众的政治觉悟提高了，群众的组织力量也扩大了，而斗争也一步一步地深入，从此开始转入与地主

阶级斗争了。一九二八年，旧历二月，正是农忙春耕时候，许多农民缺少粮食，感到困难。他们在往年只好向地主借高利贷，现在完全不同了，他们遇到困难时总是和我们商量。他们说：“农忙时节，没有粮食怎么办？而实际上他们早有主意，贼眼向着地主了。溪南党组织早已注意了群众的情绪和要求，在各支部中讨论和布置了“借粮运动”，并提出：“借粮过荒，努力春耕”的口号。我们一方面在农民协会中作了具体的布置，有组织地领导这一运动；另一方面派了一些人暗中向地主劝说，藉以减少阻力，所以借粮运动很快地在全区展开了，顺利地完成了这一任务，而缺粮和无粮的农民都得了暂时的粮食，春耕问题也就解决了。

全区规模的群众性斗争运动，是一步一步地深入，是进一步紧一步地提高。到了三、四月间，群众所借的粮食当然没有还，而春荒夏荒

依然是群众的难关，党便进一步地领导群众“分粮吃大户”的斗争。首先在中坑、胡家地等乡布置分粮斗争，并取得经验后，迅速地推广到全区。这次分粮斗争运动，高度地发挥了党的领导作用，高度地发挥了农民协会的作用，充分表现了群众的斗争力量。这次斗争是广大群众与地主面对面的斗争，在群众压力下地主们不敢反抗，除留下地主全家必需的粮食外，其余一概拿出来给大家分。因此，全区的分粮斗争胜利地成功了。

这次分粮斗争的胜利成功，不仅是使广大群众得到了粮食，更重要的还是群众的阶级觉悟的提高，斗争力量的加强。经斗争教育了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就能得到胜利。使群众知道，这不是什么人的“恩赐”，而是群众的力量所获得的结果。

这次斗争不仅溪南群众得到胜利，并且很快地影响到附近的区乡。

溪南附近有不少乡村的群众看到溪南群众得到胜利后，自动地组织起来分了地主的粮食；也有的分了地主的粮食后，因为没有党的领导，惹出事情了，不知怎么办？即派人到溪南找党的同志想办法。由此可见，溪南群众“分粮吃大户”的斗争胜利影响是很大的。

五、武装起义攻打永定城

与溪南广大群众的分粮斗争的同时，而金丰、湖雷等区也发动了这一斗争运动，并取得了胜利。因此，国民党反动派和各乡的豪绅地主受到群众运动的打击而更加恐慌了。于是，三月间永定县国民党政府召开了全县的豪绅地主会议，并讨论“清乡办法”及组织“清乡委员会”，从事镇压革命运动。在这一反动措施后，国民党政府随即派了武装队伍，袭击了金沙学校（溪南党委所在地），当即被捕了八个同志（内有两个区委委员），因而形势日益严重了。但是，广大群众并没有被吓倒，相反地，对于阶级敌人更加仇恨了，而斗争情绪更加激昂愤慨了。

问题是非常清楚的，当着广大群众的解放斗争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进到激烈化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就必然用武装来镇压革命运动，摧残革命群众。我们为了坚持斗争，为了斗争胜利地开展，就必须用革命的武装来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就必须进行武装斗争。因此，我们即决定加紧领导群众准备武装起义，以各乡有的“铁血团”为基础，迅速地从几百人发展到几千人的武装组织。在党的号召下，群众们磨拳擦掌，自动地买洋镐、鸡或粮食而买进步枪，或制土炮或造火药，夜回秘密操练，白天站岗放哨，俨然进入了战争状态。

四月，中共永定县委会，根据溪南、金丰和湖雷等地群众武装的准备情况，即召开了党代表会议，布置武装暴动问题。当时的计划，

先在金丰举行暴动，估计城内的反动军 张 贞的江湖支队必然开往镇压，而我们溪南的群众武装即可乘虚占领县城。在金丰等地的武装暴动发生后，五月十三日，果然，永定城的反动军队出动了数百人前往镇压了。溪南党委立即决定武装暴动，攻打永定城，当晚即动员了数千群众，手持土枪，抬着土炮，从四面八方地向县城前进。十四日拂晓，我们下令攻城，群众勇气百倍，猛打猛冲，一直冲到城内的衙门前。当时我们没有指挥战斗的经验，而群众又是初次作战，凭热情，凭勇敢，乱打乱冲，我们不知道先清除城内的残敌，而想先营救被捕的同志，打敌人的监牢，因而，据守据点的敌人得以从容反攻。敌人反攻了，我们的武装部队巷战了二小时，相持不下。后来不得不退出城外，形成层层地包围了县城，敌人也不敢出城，而我们也攻不进去。我们打了一整天，有许多群众没有吃饭，但勇气仍然很高，天晚了撤回来，天一亮又自动地包围县城，又打了一天，第三天仍然是这样。后来邓子恢同志从上杭赶到溪南，商量决策后，才停止攻城，立即转到各乡村深入土地斗争，建立苏维埃政府。

六、成立溪南苏维埃政府实行没收和分配土地

我们攻城后，即转为领导各乡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工作。在各乡召开群众大会，宣传解释苏维埃政权和土地革命的意义，并选举政府委员和主席，成立乡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即以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为中心的去开展工作。

乡苏维埃政府设立土地没收分配委员会，它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发动群众反对豪绅、地主封建势力的斗争，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进行烧毁田契、债约，并调查登记土地和没收分配土地。设立军事部，负责军事工作。将全乡十八岁至、四十五岁的男子全部编成赤卫军。指挥赤

卫军和反革命斗争，并实行赤色戒严、站岗、放哨、守卫以监视反革命的活动。设立财政部，负责没收地主豪绅及一切反革命的粮食，并向他们筹款，作为政府的行政与作战经费。设立肃反委员会，负责镇压反革命的工作。

溪南在短短期间，就成立了十多个乡苏维埃政府。七月间进行溪南区区的选举工作，选举区的代表，八月召开区的代表大会，成立溪南区苏维埃政府，并颁布了土地法、劳动法、肃反条例、婚姻条例等新法令。

苏维埃政府的成立，不仅废除了反动派的压迫和剥削人民的旧制度，旧法令，而主要是标志了人民的翻身，人民政权的建立，从而建立了保护人民利益的新制度和法令。

当时，苏维埃政府的中心任务是领导战争和没收分配土地。在焚烧田契、债约之后，群众迫切地要求分田，而且秋收快到了，群众都希望赶快分田，并可得到现成的粮食。以邓子恢、张鼎丞为领导的党组织是在紧张的车事斗争中领导分田的，同时没收和分配土地的工作，是第一次地尝试，没有经验，困难是很多的。但由于我们能够积极地研究和依靠群众的创造性，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在溪南没收和分配土地的创举中，邓子恢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创造性的精神是成功的。邓子恢同志找到有经验的，熟悉土地情况的老农民（雇农、贫农、中农、富农）来开会，进行详细的有系统的调查研究。从而，作出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政策，并作出具体的办法，交给苏维埃政府讨论和正式决定。这个政策和办法：以乡为单位，即以本乡人民现有亲自耕种的土地，作为本乡的土地所有权，归本乡按人口（除反革命分子外）平均分配土地；又用抽多补少的办法（根据各户现耕的土地多少，按全乡每人

平均应得的亩数为依据，有多的抽出来，不足的补给他）去实行分配。

我们依据这个政策和办法，首先在金沙乡作典型试验，召开各种会议，进行动员解释，并由没收和分配土地委员会进行人口和土地的调查登记，公平合理地分配，分配后写榜公布，说明每人分得土地多少，土地在什么地方。公布之后又召开群众大会，大家一致通过了，就正式宣布各人分得土地的所有权。在全乡人民正式掌管和使用分得土地时，而土地分配的工作就算成功了，即举行庆祝大会，庆祝苏维埃土地革命胜利。

我们在金沙乡取得分配土地的经验之后，即展开全区土地革命和分配土地的工作。在很短的时间中就分配了十多个乡的土地，约有两万人左右的地区内，完成了土地分配的工作，广大人民得了土地果实。

溪南人民，在我党的领导下，经过英勇的斗争，从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没收和分配土地。从这个时候起溪南人民的政权与反动派的势力尖锐地对立着，并进行了残酷的战争。溪南与永定县城只有一衣带水之隔，在城里经常驻有敌人的优势兵力，原先是张贞的江湖支队，八月以后是郭风鸣的一个团。这些敌人经常不断地进攻溪南，实行烧杀和劫掠，而溪南人民拿着原始的武器与优势敌人坚持了半年以上的革命战争，这是极其光荣的，显示了人民的力量是不能战胜的。

但是，由于我们缺乏作战经验，缺乏武器和弹药，尤其在全国革命形势尚处在低潮时期，而闽西各县的武装暴动也不普遍（仅有几个不相联系而又不大的地区）；并且武装斗争又是单纯军事观点，缺乏积极地向外发展，以牵制和分散更多的敌人，而给溪南强有力的支援。同时，还必须指出，溪南半年来的斗争中也存在着许多缺点，主要是：

缺乏创造比较坚强的主力部队，寻找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主动出击，因而，使自己陷于被动应战的状态中；使斗争中的溪南人民遭受了敌人的烧、杀、淫、掠和抢劫等极其残酷的摧残，而人民的生活十分困难。虽然如此，但溪南的共产党人和全体人民，在残酷的战争中充分地表现了坚决与勇敢的革命精神，这更是难能可贵的。

由于敌人的残酷摧残，由于我们的孤军奋战，到了九月以后，有些群众对于战争已感到疲倦，对于继续斗争并坚持到产后胜利发生了怀疑。首先是中间分子要求停战并抛出与反革命妥协的呼声。当时党认为与反革命调和妥协是危险的，并提出：“杀死调和妥协分子”的口号，并且实际上杀过一些这样的分子。可是要求停战的呼声却越来越多地并成为群众的要求了。他们要求苏维埃政府想办法把战争打出去，不要单单在溪南小圈子里打来打去，使人民无法安生。这些要求和呼声，我们已经感到这个问题是十分严重的问题，但是没有提出更好的办法来解决，又没有更多的理由来说服群众，而战争又是激烈地继续着。最后群众向我们这样提出：“大家都知道苏维埃土地革命是好的。大家都要革命。大家都拥护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可是现在我们的地方太小，太孤单了。最好你们把其他地方的工作都做起来，我们暂时与反革命妥协一下，我们暂时做个“白皮红心”，以保存革命力量”。在继续不断地接到这样的要求后，党不得不考虑，如果仍然拒绝群众的要求，那么我们将要脱离群众，战争不仅不能胜利，而且必然要失败，因此就决定允许群众派代表与反动派讲条件，达到有利于革命的妥协。

七、党提出新的斗争方针与新的工作方法

党处在斗争的转变关头，我们首先健全党的支部，严密党的组织，加强秘密工作。我们重新恢复农民协会与“铁血团”的组织（暴动后